

杜魯門的悲劇時代

余淑蓮

——麥克阿瑟筆下的杜魯門與韓戰

亞洲人的一頁痛史

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）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美國中部標準時間七時五十七分五十分，美國前總統哈利·杜魯門病逝，享壽八十八歲，可以說是福壽全歸。噩耗傳出，舉世哀悼，正如美國前總統詹森所說的：「一位二十世紀的巨人凋謝了，任何時代，很少有人像這位獨立城的人那樣塑造過世界。」美國現任總統尼克遜也稱譽他為：「我們歷史上最勇敢的總統之一。」然而，杜魯門為他自己所選擇的墓誌銘，却祇是簡單明瞭的一句話：

「在此長眠者為哈利·杜魯門，他已盡其所能。」

杜魯門病逝次日，美國著名的「華盛頓郵報」即發表專文，該報在這篇專文的末段指出：

「杜魯門的時代已成過去，他對歷史的功過，亦將蓋棺論定。」

但是，該報畢竟未能否定：「在亞洲局勢危疑震撼之際，史家將對杜魯門當年使中國大陸淪

入共黨之手的作法，有所批判。」該報曾謂：「在現代中國人的記憶中，對於杜魯門處理中國問題的態度，將永遠難以忘懷。一九四九年間，正在毛共以龐大軍力席捲中國大陸，中華民國政府陷於艱困苦戰之際，杜魯門下令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一項『中美關係白皮書』，把毛共勢力坐大的責任，完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。對於杜魯門對國軍停止軍援或美方政策影響，包括雅爾達密約，馬歇爾的愚昧調解壓力等因素，全未列入。『白皮書』代表中美關係最黯淡的階段，不僅中國政府和民間都力予反駁，連美國有識之士也不以為然，並在國會中引起很大的爭論。無論如何，杜魯門對於中國大陸淪陷的悲劇，難辭其道義上的咎責。」

筆者在此却必須更進一步的指出：杜魯門是人類歷史上，唯一作戰不求勝利，對不堪一擊的敵人心懷恐懼，輕易放棄聯合國的崇高原則，以及亞洲人民信賴的美國總統，乃至於任何國家的元首。筆者不敢說，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一時，杜魯門宣佈解除韓戰時期聯軍統帥麥克阿

瑟元帥職務，係屬一種親痛仇快之舉。然則，却有如麥克阿瑟元帥所說的：

「我被解除軍職最重要的意義，倒不在於與此事有關的人物全是要員，而是由於美國對亞洲的態度，發生了基本變化，這種改變，造成今後的若干災難事件。……聯合國的憲章和宣言，獲得亞洲的普遍信賴，可是，聯合國放棄了這些原則，而損失自由世界的希望，在亞洲產生了悲慘的後果。……其它亞洲國家，開始顛抖不安，面向中立主義。」

想當年，麥帥力主揮戈北指，直搗黃龍，美韓聯軍深入東北境內，協助中國國軍反攻大陸，消滅朱毛，根本鏟除全人類最大的禍患——中共。在當時來說，麥帥確屬勝券在握，他的戰略是具有全球性的，麥帥曾經高瞻遠矚的說：

「共黨陰謀者，早已選定亞洲作為他們征服世界的起點。我們已經在戰場上和他們搏鬥，我們在這裏替歐洲用武器作戰，而歐洲的外交家却仍是一片空言。如果在亞洲的這場戰爭，敗給了共產主義，歐洲也不免淪陷。如果我們贏得了這

場戰爭，歐洲就可以避免一次大戰，而且還能維持自由。我們必須勝利，沒有任何代價可以代替勝利！」

然則，偏偏就有當年掌握世界命運的杜魯門總統，他千方百計限制他的戰地司令官——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及其麾下聯軍健兒。在勝利來臨之



，力克平壤，圖為軍容壯盛的入城式。

前，迫使他們與勝利絕緣，不顧前方發出的警告，任讓數十萬中共軍安全渡過鴨綠江，以聯軍健兒作獻祭的犧牲。甚且，爲了私人政治立場關係，不惜陣前易將，解除麥帥的軍職。由此而始，韓戰、越戰，乃至於今日國際姑息主義的瀰漫，公理正義的消滅，全球一致的悲劇，莫不俱由杜魯門在二十二年前的此項決策所引起。

痛定思痛，我們亞洲人誠有「寒日飲冰，點滴心頭」之感。所以，此時此際，將麥帥被免職前後的一篇赤裸報導譯出來，也就特別的具有意義。華盛頓郵報說：杜魯門的時代已成過去，站在亞洲人的立場，我們却要心情沉重的說：「杜魯門的悲劇，猶在方興未艾！」

以下便是麥克阿瑟元帥的自述——

戰爭目的唯在勝利

一九五〇（民國三十九年）九月，仁川登陸成功，世界各地祝賀的函電充滿了讚譽之聲，在許多電報中，給這次勝利對於遠東心理影響最大者，猶較歐美政治家更爲了解者，首推中華民國的蔣總統，和大韓民國的李承晚總統。然而對於韓國未來的問題，和美國最高首腦部的考慮，却令我深感不安。我當時曾向華克將軍吐露我憂慮的心聲：

「自古以來，戰爭的唯一目的，是力求戰場上的勝利，建立對政治有利的和平情勢。」

再者，達到戰爭成功的願望，不僅要求軍事上的勝利，而且要利用軍事勝利作政治上的靈活運用。縱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，而求得了軍事上

的勝利，若不能藉此導致政治上有利的和平，犧牲將毫無價值可言。

依我之見，利用仁川登陸勝利的時機，立刻在暗中求取政治的和平。此刻正是以軍事上的勝利，換取結束戰爭的最佳時機。

我們的外交當局，應該充份發揮外交影響力，讓蘇俄和中共充份瞭解並領會：美國在韓國決無任何野心，除了保障其國家的獨立外，別無所求。

現在，反顧我們的外交陣線，簡直沒有發生一點效用，對於如何利用仁川軍事上的勝利，早日恢復韓國的和平秩序，迅速而有生氣的外交活動，根本一點都沒有推動。

時機瞬間即逝，一舉可以結束戰爭，確立太平洋和平的難逢良機，白白地給浪費過去了。

我們的政治和外交運用太欠靈活，敵人乘我們在躊躇和讓步的機會，來一次新的軍事行動，這是最担心的。如果不把握時機，戰爭不但不會結束，反而會再延長。

華克將軍十分同意我的觀點。我們的憂慮，不久竟成爲殘酷的事實。

由於仁川登陸的成功，造成輝煌的戰果，未能利用於結束戰爭的外交活動，尋求和平，聯合國之間的爭辯隨之爆發。美國的立場，認爲北韓的軍隊，如果不予澈底擊潰，那麼，大韓民國勢將再暴露於共產侵略的危險之下。

但是，以英國爲首的國家，對聯軍越過卅八度線北進，表示反對，他們認爲根據道義的信念，藉妥協的方式，更能獲得較大的效果，並且他

們相信共黨頭子們，也會響應妥協。

聯軍爲了要掃除北韓的殘餘兵力，究竟應否越過卅八度線呢？不越過的話，北韓軍會在卅八度線背後，再度整編、訓練、裝備新軍，以便隨時再發動戰爭。可是，此一行動是否會獲得許可，實在值得憂慮。

九月底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發來他們所稱的



一九五〇年十月杜魯門在威克島約晤麥克阿瑟將軍，舉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議。

：「關於你在韓國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詳細指示。」此一命令簡述如下：

「你的軍事目標，在摧毀北韓的武裝部隊。爲了達成此一目的，你被授權在卅八度線以北採取軍事行動。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你的地面部隊、空軍和海軍不得越過韓國邊界，進入中國東北和蘇聯邊境。」它並且指明，在接連中共和蘇俄邊界的地方，不得使用韓國以外的軍隊。

再者，「將軍在卅八度線以北和以南進行的作戰支援行動。不包括對中國東北和蘇聯境域的海空攻擊。當北韓軍有組織的軍隊抵抗終止時，有關解除北韓的殘餘武裝，和投降事項，應委諸大韓民國軍隊負責。」

至於應該用何種方式佔領北韓？可視當時情勢定奪。「惟將軍關於佔領北韓計劃，甚望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。」

當時，我便提出下列的答覆：

「我的計劃，簡單地列述如下：

一、第八軍以現有的軍力，越過卅八度線，向前進擊，以平壤爲攻取目標，主要地是要攻擊以平壤爲軸心的防衛線。另一方面，第十軍在元山實行兩棲登陸，和第八軍會師。

二、第三步兵師，留在駐日總部俟機而動。

三、連結定州、寧遠、與南以北的戰線，由大韓民國單獨進行。

四、第十軍預定攻擊日期爲十月十五日至十月卅日止。」

九月卅日，聯合參謀本部，對此計劃正式承認，六天以後，聯合國也確認並通過了此一決議

案。我所接受的命令，極明確地是揮軍北進。此後的報紙報導：聯合國決議的目的，旨在將敵人趕回卅八度線，而我超過卅八度線，則是一種越權的行爲，這真是荒唐無稽的說法，我只當着沒有這回事。

這項決定，立刻便引起中共干涉的陰影，實際上，當華府六月間下令第七艦隊阻止台灣的軍事行動時，已經有中共干涉韓戰的可能性。

這項命令，無異是保護中共的部隊，免受蔣總統五十萬大軍的攻擊。由於有這種庇護，被派在華中區沿海的兩軍中共部隊，方始得以抽調移用。

據報告，這些部隊已經向東北移動。像這種使中共成爲安全地帶的安排，使得中共行動自如。假使中共介入韓戰，我便要面臨一場新的戰爭了。

可是，很奇怪的，聯合國對這種令人痛心的問題，居然抱着旁觀的態度。這種不祥的憂慮依然存在，政府當局，雖然有所感覺，但他們不但不講求如何處理，甚至連一點考慮都沒有。

由於外交方面的疏忽怠慢，未能把握仁川勝利的機會，迅速恢復韓境的和平秩序，亦未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，以至發展成爲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。

率直問道競選與否

十月十二日，我接到馬歇爾將軍的一封信，杜魯門總統願和我舉行一次會商。馬歇爾將軍的電報說：「總統建議於十月十五日在檀香山與

你會晤，但是，假使使你認為情勢無法抽身，飛出這樣遠的話，總統也高興前往威克島。」我覆電說：「我願意在十五日晨在威克島相會。」

我除了知道屆時哈里曼也將出席之外，關於會議的其餘目的，一無所知。許多東京記者要求同行，我把他們的請求轉呈五角大廈批准，但使人驚異地，這項要求竟被批駁。

杜魯門總統一行，搭乘三架飛機抵達，隨行人員有卅五名記者和攝影記者。當我和總統握手的時候，杜魯門說：「元帥，我老早就想同你談談。」

我答道：「我希望下次不會隔得太久。」可是，事實上却永遠沒有下次了。

有人警告我說：杜魯門總統是一位脾氣急躁的人，而且頗有偏見。但當我們會面，他一直對我優禮有加，談吐幽默。他有平易近人的品格，機智而敏於辯論，一見面，我便開始對他發生好感。

杜魯門不斷在談論着許多歷史上的知識，他確實讀過不少書，可惜都是表面上的知識而已。

遠東方面的情况，他知道的更少，他有許多歪曲歷史的看法，並混雜着奇怪的意見，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話，例如：必定要在不久期間內，援救那些和共產主義戰鬥的一些人等等。

總統帶着許多高級官員前來，包括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雷德福上將，陸軍部長佩斯、特別顧問哈里曼等等。此外尚有總統的助理一大夥人同來。而我祇有軍事助理和副官各一人，除此之外，便是機師和新聞官羅斯，會談內容不作記錄。

威克島的氣候酷暑異常，總統脫下了上衣，我從口袋中掏出一枝新煙斗，問道：「你不介意我抽煙吧？總統。」

總統答稱：「不，我想，誰都比不上在我面前抽煙的人那麼多。」接着是一陣笑聲，看來，總統像是很快樂。

會議本身氣氛非常調和，沒有討論以及提出新的政策。身任聯軍統帥的我，有關牽涉到責任問題的，我都一一呈報華府批覆。

在整個會談中，台灣問題未曾提出，直到會談快要結束時，總統垂詢中共介入韓戰的意見。我回答他說：「國務院通過它在國外的外交收聽站，或中央情報局，都未曾報告北平政府以主力部隊介入韓戰的任何證據。根據我個人的軍事估計，由於我們擁有所向無敵的空軍武力，可以摧毀鴨綠江兩岸敵人的基地與補給線，任何中共的指揮官，都不敢冒險向滿目瘡痍的朝鮮半島投入大批部隊。」這一點，在場的人誰都沒有異議。

可是，在新聞報導上，却發生了顛倒黑白和歪曲事實的現象，他們很巧妙地曲解我的立場，竟指稱我曾斷言，中共在任何情況下，都不會介入韓戰。曲解的事實，至為明顯。

會議僅一小時卅六分即已宣告結束。當我送總統離開威克島，在閑談中我很不客氣地問他是否要競選連任總統。因為最近在東京，日本天皇曾向我提出此一問題。

杜魯門總統通常在會見記者的場合，對於這種詢問，總是避不作答的，不料他竟反問我是否有政治野心？我對這個問題不須閉避，我告訴他

說：「一點念頭都沒有，如果將來有一位將軍和你競選，那位將軍將是艾森豪威爾，而不是麥克阿瑟。」

總統為之大笑，他說：「在個人的立場上，我是喜歡艾森豪的，但是，艾森豪不懂得政治要義，如果他作了總統，他的政府將奉葛蘭特總統為典範啦。」杜魯門總統好像還想繼續地發揮下去，但我趕忙把話題轉往輕鬆平和的話題上去。

在威克島機場上，出人意外地，杜魯門總統忽然走到攝影人員事先準備好的麥克風前，以總統的名義，向我頒授勳章，這是我五次被頒授特殊功績勳章。

在威克島會談中，我感到華府開始有了值得令人憂慮的變化，像二次大戰時羅斯福總統那樣氣魄雄偉，有膽有識的領導人物已不復見了，相反地，呈現着姑息妥協的猶疑政策。

杜魯門總統最初對擊潰亞洲共產主義的信心，充滿着勇氣和決心，但由於綏靖和姑息份子所包圍，竟致逐漸崩潰殆盡。

總統好像被聯合國一些政客的說詞所困惑，雖然曾一再明白地表示不惜一戰的冒險決心，然而曾幾何時，僅祇兩三個月，此種決心即告煙消雲散。

我站在戰地司令官的立場，感到非常驚異：我一直為勝利而戰鬥，但政府却一面投入美國士兵犧牲性命，一面却又低估此一戰鬥的重要價值。

威克島的會談目的何在，很難使人推測，有些人認為那是玩弄政治手腕；因為距美國選舉不

過兩個星期。但我相信這種說法對杜魯門總統是不公平的，我相信他完全沒有那樣的動機，他唯一的目的，是要建立對國家有利益的結果。

我的此一印象，當杜魯門返回華府途中，親自寫給我的信中，足資證明：

「威克島的會談，余感十分滿意。和你相聚，得以就日本、韓國和其他遠東各國的情況交換意見，內心愉快實難言喻。吾人面臨之亞洲情勢，承蒙多陳高見，深感欣慰。此次會談，國內批評甚佳，即使未獲得其他任何成果，其價值亦實可觀矣。」

我在回信中，有如下的申述：

「我在此次會談中，能有機會恭聆教誨，加深彼此了解和交換意見，獲益非淺，我懷着滿足的心情，離開會談的場所，我切望能利用此次會談，增加吾人的了解，為將來建立堅固的防線。」

可是，我的意見竟完全落空，宣傳與偏見的惡浪，正向四處蔓延。

不准前進不許獲勝

十月廿日，第八軍攻入平壤，利用空中及地面攻擊克復北韓首都平壤。

此一行動，是自新幾內亞以來從未用過的戰術，將敵人退路完全切斷，我在飛機上、視察平壤的攻擊戰，並在平壤機場着陸。

平壤是敵人的首都，該城的陷落，象徵着敵人完全失敗，現在，所有組織性的抵抗，幾近尾聲了，僅祇剩下些殘餘。由此看來，共產黨的侵略戰是完全失敗了。聯合國，特別是美國的威望

，在亞洲再度恢復過來。

杜魯門總統寄來一封賀電：「威克島會談以來，將軍指揮下的部隊，仍然是不同凡響，本人再度由衷表示祝賀之忱。在將軍指揮下，在韓國進行的軍事行動，為世界和平厥功殊偉。」

但是，在平壤，我和華克將軍對第八軍的補給，却在漸漸感到不安。不論任何軍事行動，補給掌握着作戰的神經系統，可是越海運來釜山的補給物質，由於鐵路等交通系統，經過幾個月的防衛戰，已被我軍破壞殆盡了。

仁川港在我實行兩棲登陸作戰時，曾被指稱潮汐不利。而平壤的鎮南浦，則僅具極有限的卸貨能力。

補給若在不利的情況下，不及時補救的話，繼續向北推進，不得不為之延擱。況且，在鴨綠江的那一邊，中共軍集結了驚人的大部隊蠢蠢欲動，對我們是極為不利的事。

可是，華府方面使我們憂心的命令，不斷地送達，限制我們的空軍越過鴨綠江，窮追敵人的飛機。

如此看來，東北和西伯利亞，成了敵人的安全走廊，敵軍從上列地帶襲擊並破壞我們，我們亦無法向他們施予報復。

尤且，更禁止我們轟炸沿鴨綠江的水力發電所，和北韓的補給中心羅津，這一點使我十分費解。

羅津既不在中國境內，也不在西伯利亞，而是一個位於朝鮮東北部的鎮，並且是從蘇聯海參威輸送物資的屯積站。——我所持有的武器，

正面臨着一件一件地，被逐步地奪走。

十一月廿一日，第十軍的先頭部隊到達鴨綠江岸。可是，華克將軍逐漸感到前進的困難，他向我提供如下的報告：

「第八軍正在廣大的戰線上，追擊敗北的共軍，由於各部隊之間，間隙很大，平壤北進的部隊，所有的補給，幾乎全賴空軍接濟。」

「像這樣地補給狀態，在比較輕微的戰鬥下，尚可勉強維持，但若遇到堅強有力的抵抗，顯然無能為力。韓國第二軍，在受到敵人的攻擊後，已陷入混亂，且已喪失戰鬥力，顯然地，無助於固守據點及防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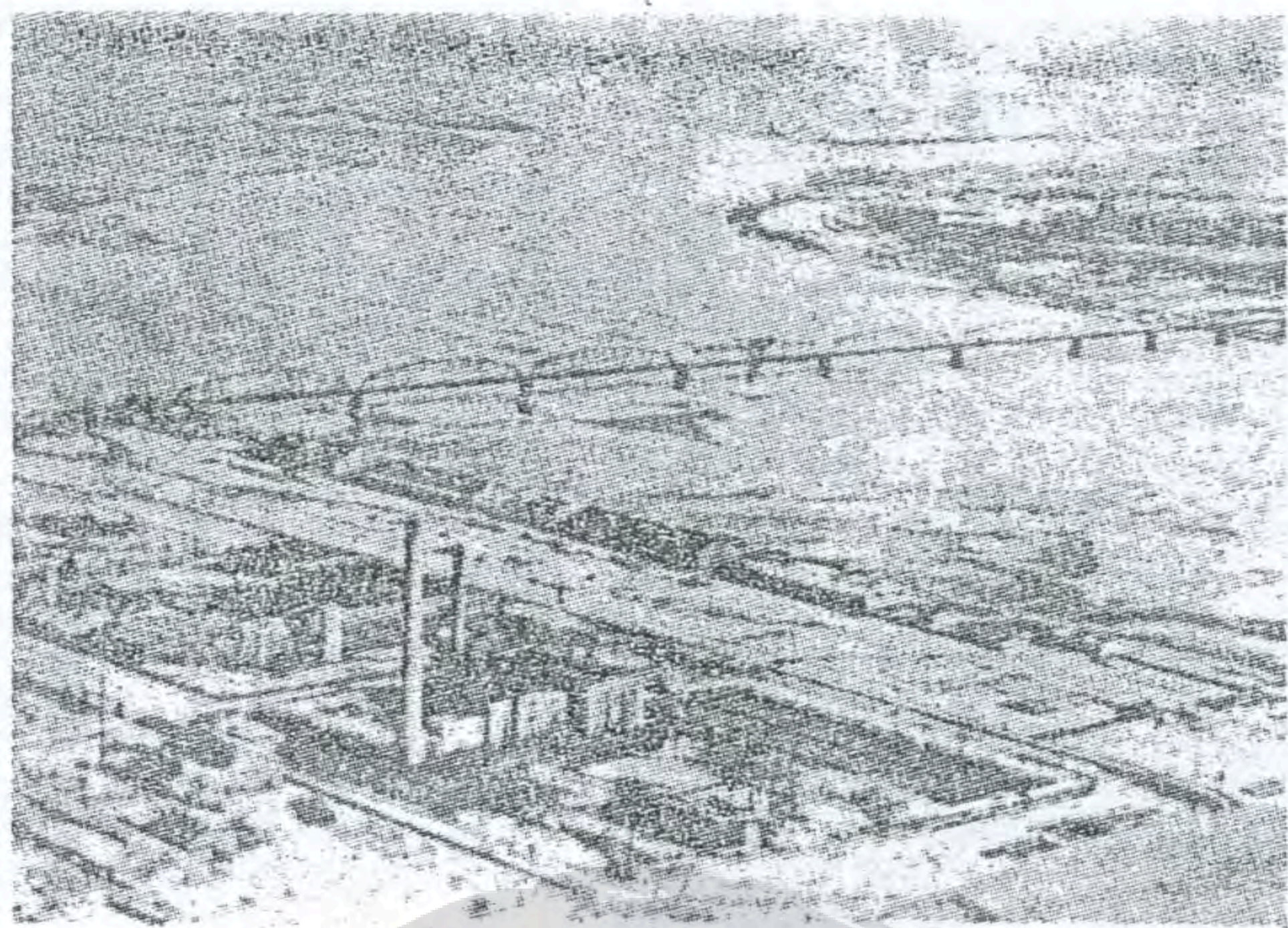
「在現狀下，各部隊在展開局部戰鬥，並正全力確保所有據點。為了應付中共軍的出現，現正準備二度出擊計劃，並將此一計劃提早實施。」

此一情勢，由於中共正規部隊的介入，而有所改變，約有三個師的中共軍在戰場上出現。因而這裏發生了一個大問題。這是中共大舉偵察行動呢？抑或是在東北重新整編的北韓軍？中共軍有多少兵力加入？僅祇是虛張聲勢？還是全面攻勢的猛衝？對北平此種政策決定的情報來源，仍然是華盛頓而非韓國前線。這樣我便處於最危險的真空狀態之中。

十一月三日，我把從共黨方面獲得的作戰命令情報提交華盛頓，列舉出中共軍在東北部隊實力和分佈的情形，總計有五十六個正規陸軍師，分屬十六個軍，人數為四十九萬八千人。此外，他們還擁有卅七萬「地面後勤部隊」，其他部隊

亦從華中調集。我不僅把這項情報提供華盛頓，而且提供聯合國。不論是華盛頓或聯合國，如果把中共的威脅看得太嚴重，都可能隨時阻止我們的軍隊前進。然而，我接獲的命令是這樣的：

「中共的大部隊如果沒有作事前警告，即使



中韓邊界的鴨綠江鐵橋，麥帥揮師攻抵橋畔，但由於杜魯門的一再阻止，唯有望橋興嘆！

對朝鮮半島公開或秘密地使用武力，將軍指揮下的部隊，若對戰爭有成功希望的話，自可採取行動。但是，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若對中共境內的軍事目標，採取行動時，事前必須得到華府方面的批准。」

儘管華府對我施加若干約束，但是為了阻止中共軍的大量介入，我覺得還有一件武器可以使用。我指示梅耶中將使用B-29轟炸機九十架轟炸鴨綠江橋樑，切斷東北和北韓的交通線。

詎料，馬歇爾將軍立即發來一封電報，撤消我的命令，並且暗示我說：「擱置對於距離東北邊界八哩內所有目標的轟炸。」

超過鴨綠江向北韓運送補給物質，和動員大量兵員一擁而入，成為廣大天然的屏障，這鴨綠江鐵架橋樑無疑地不會遭到任何危害，同時，還要為他們保留八公里的地方，以便使他們建築攻擊點。我無法描述我當時驚駭的情狀，我隨即發出一封電報，提出有關鴨綠江對岸中共軍的蠢動，並申述如下的意見：

「為阻止敵人的蠢動，除了轟炸極易渡越的一座橋樑，和北韓內部設施外，別無他法。我認為依照戰爭規則的行動，應該被接受和承認，撤消我的轟炸命令，將招致重大災害的危險，我不能對這種災害負責。在受命之餘，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，時間太重要，我要求貴部重新考慮，或轉呈總統再予檢討，敬希火速核示為荷。」

結果我只接獲一項修改的命令，雖然已較前者緩和，但亦僅止於在韓國這端鴨綠江的橋樑，准予轟炸而已。我要求梅耶中將研討此一可行的

條件，他說：「很顯明地，此事無法施行，華府對此不可能毫無所知，可能是故意許可的。」

此外，梅耶將軍指揮下的轟炸隊司令官奧特納將軍，對當時的情況作了如下的說明：

「在不侵入中國東北境內的限制下，只有將鴨綠江南端部份，作為轟炸的目標，可是沿這一條線，敵人已架起一排高射砲，可對我們的轟炸機，從頭至尾予以猛烈射擊。」

由於我們受着被反擊的掣肘，我們只有忍氣吞聲，敵人的機羣，在我方編隊三公里處，可以同速航行，當我們投彈前一刻，他們即前來襲擊。尾追我們的編隊之後猛烈地射擊，然後安然地飛進安全走廊。一位作戰曾受重傷的轟炸機隊員，掛着一隻要掉下來的臂膀，口吐着鮮血，不停地喘息着說：「將軍，華府和聯合國究竟站在那一邊？」我聽了真是難過萬分。

我知道華府不允許轟炸鴨綠江橋之後，擬妥一封電報，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職務。我滿懷痛苦地對參謀長西凱說：「一位統帥不能保護自己的將士，不獲准使用武力保護兵士的生命和部隊的安全，這是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。依我之見，這僅是悲劇的前兆，我對此事甚感悲傷。這種措施足以使數千美軍喪失生命，部隊將淪入危境。毫無疑問地，敵人司令官早有先見之明，否則絕不敢如此大膽地出兵。」西凱很感沮喪，他堅稱陸軍決不會諒解我的引退；他認為對國家及個人榮譽而言，我不應該在這樣危急關頭驟然離職。並使部隊因而喪失士氣，於是，我撕毀了我的電報。（下期續完）